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Buddhism of the period. For instance, Shen notes that the Tang clay tablets, such as the one in Figs. 4.1A & B, probably reference the flesh body (*rūpakaya*) understood in the two bodies theory in Buddhology (p. 117). She, at the same time, mentions the three bodies theory (*trikāya*) as a Mahāyāna doctrine, though one should note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tter probably post-dated the clay tablets in the mid-seventh century.⁵ In the book, Shen also frequently uses the term “votive.” However, as Peter Skilling points out, votive tablets or ex-votos were used in Greek, Roman, and Catholic traditions as votive offerings to a divinity or a saint after fulfilment of a vow, whereas Buddhist moulded images, tablets, or plaques were made to produce merit and for future benefits, not in gratitude for past blessings.⁶

All in all, the book provides a new lens to understand the materiality of Buddhist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a. It introduces many important topics with up-to-date scholarship and opens up other topic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t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Chinese Buddhism and Buddhist art.

DOROTHY C. WONG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Michael Szonyi.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World History.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2017. Pp. xiv + 459. \$195.00.

西方學界對中國歷史研究參考工具書籍的殷切需求，從英國學人、外交官 Endymion Wilkinson 所編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Research Guide* (《中國近代以前歷史研究手冊》) 的試行本 1973 年面世以來，一紙風行，至去年止，前後刊行五版即可見一斑。隨著中國歷史研究在西方學界蓬勃發展，該書內容也與時俱進，書名從 1998 年初版的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中國歷史手冊》)，直到 2012 年三版以降的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中國歷史新手冊》)，篇幅則相應從試行本的 219 頁

⁵ See this author’s discussion in *Buddhist Pilgrim-Monks as Agents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ans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Art Style in East Asia, ca. 645–770*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8), p. 46.

⁶ Peter Skilling, “The Aesthetics of Devotion: Buddhist Art of Thailand,” in Heidi Tan, ed., *Enlightened Ways: The Many Streams of Buddhist Art in Thailand* (Singapor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2012), p. 21.

激增為第五版的1,302頁，內容全面而完整，成為西方中國學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參考工具。編者 Endymion Wilkinson 於2014年獲頒法國漢學界最高榮譽的 Prix Stanislas Julien (儒蓮獎)，可謂實至名歸。

相對於前書成於一人之手，聚焦於研究參考工具，本書集思廣益，邀集一群跨世代學有專精的學人，勾勒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狀況、近期及未來一些引人注目、最新及前途遠大的學術發展動向，提供廣大不同對象讀者群所需的瞭解。書中揭示中國歷史的新研究，挑戰前人所堅持人類社會發展規範的看法而外，也促使歷史知識的整體新領域出現，為致力處理當前人所關心議題的學者提供新想法和新工具。編者在導言中指出，本書面世正合時宜，蓋自毛澤東死後四十年間，中國大陸史學界的研究轉變既顯著又迅速，包括領域的核心假設動搖，前代史家的方法取徑削弱，史料爆炸，新數位工具和世界各地學者的新網絡發展迅速，史家提問的問題屬性轉變，以及領域對自身意義和關聯的感受改變，歷史論述及主張在當代政治以有趣及獨特方式出現。

本書作者以多樣不同取徑論述他們的課題。導言而外，書中論文由三類別組成：領域現況 (States of the Field)、年代 (Chronologies)、題材與取徑 (Themes and Approaches)。因篇幅所限，而書中論文內容又涉及多個不同領域，筆者只能擇要介紹，無法就每篇論文逐一細表。

第一部分「領域現況」所收論文包括：Endymion Wilkinson 就中國歷史的五個時期(史前至今)的史料及歷史書寫(古生物學及考古資料、史著、傳授文本、新史料、迄1949年的民國及1978年後的中國歷史著作)提出一個精簡概觀。作者語重心長表示，相對其他文化，隨口誇張形容中國史料數量浩如煙海，只是把事實單純化，未免誤導。程美寶一文表明因新的自由而超越政治形塑的狹隘研究日程，對中國史學領域的重大影響，突顯1980年至2010年間大陸史學工作中，社會史、地方史、歷史人類學各種取徑出現消長盛衰的轉折，試圖捕捉大陸史家過去三十年間在國史編寫方面的關鍵所在。斯波義信論文申論明治以降日本中國史研究的業績，闡明代表人物的學術譜系及院校關係，強調法制史、社會經濟史基礎著作的影響。Harriet Zurndorfer 論文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中國史研究在歐洲的主要成就及趨向，認為漢學傳統還沒有完全消失，強固的語言訓詁傾向依然是研究中軸。對於歐洲中國歷史研究若干問題及長期前景，論文也有所衡估。Geremie R. Barmé 與編者 Michael Szonyi 合著的論文闡明作為理解、批判及參與政權的工具，歷史在當代中國政治扮演的角色。中國官方藉著再現過去、古為今用的方法，強調否極泰來，這與個人回憶錄，以及專業史家、藝術家和作家的過去經歷，不易共處下去。Gregory Blue 一文主要就世界史文獻一個具體面向考慮如何論述中國，重點集中於若干專志於世界史寫作的傑出學者，怎樣將中國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架構中描述；隨著殖民地及新帝國主義時代諸如中國持續不斷的孤立及奇特的歷史停滯等觀感想像備受挑戰，中國陳述在世界史文獻中也相應改變。

第二部分「年代」共有九篇按年代順序排列的論文。編者指出本書若有好幾十年前出版，這一部分每篇論文大概會逐一按朝代，或根據來自西方的普遍經驗，貼上古、中古及近代標籤的分期設計來編組。與此相反，本節組織整體上反映當下對於中國歷史分期如何方為最合適的意見分歧；本節論文之間即由許多重疊交錯、偶爾矛盾的分期設計所限定。Michael Puett 一文聚焦於新近大量考古發現的資料，讓吾人得以在比較架構中，針對過去歷史的較大問題開始再思考，並重新作系統性的表達。Charles Holcombe 論文將東漢覆亡至中唐作為一個單一歷史時期，勾勒其間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思想根本轉變的梗概，強調主張某類含糊的中世存在於中國尚無大礙，卻不應過於受限於來自西歐中古的狹隘經驗模式，將二者混為一談。Nicholas Tackett 論文對英、美的唐宋史學界專注於探討唐宋變革各類成份要素的業績提供一個概觀，挑選中、日文相關著作評述；全文聚焦於穿越唐宋時期與六個論題有關的變革：(一) 社會政治菁英；(二) 制度與政治文化；(三) 經濟；(四) 思想與宗教；(五) 婦女與性別；(六) 對外關係與原型國族主義 (proto-nationalism)，並以討論方興未艾的五代史研究作為終結。Michal Biran 論文簡介非漢族王朝及其他游牧帝國的共同內亞面相，評論非漢族王朝被邊緣化的原因，指出漢化的觀念和假設不可避免地對非漢族王朝的歷史書寫深度扭曲，並從史料及歷史架構，檢視導致吾人重新瞭解這類政體的發展。Paul Cohen 論文特別針對論述十九世紀中國時，瀰漫於美國主要史學傳統的假設，批判地詳加鑑定及分析。Janet T. Chen 論文概述民國史領域的近期發展，尤聚焦於分期及檔案接觸使用對形塑研究規劃的影響等問題，指出現在民國史編寫的明顯趨勢之一，厥為評價更為正面，強調儘管對舊社會嚴加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沿續國民政府所啟動的發展。S. A. Smith 論文先回顧近二十年間新文獻資料的成長及利用，以及後見聰明之益，大陸及西方學者能將毛時代放於較長遠的歷史視景觀察，使毛澤東時代二十七年間，中國不同社群在政治、社會、經濟生活多方面備受深刻改變的歷史，撰寫可以更為寬廣，較具批判性，也較少受限於意識形態，並對其間重大事件的學術理解，有所改變。論文反思近期歷史編寫的重要，藉以瞭解毛時代對中國隨後歷史的意義結束，表示雖對世紀之交的史學發展概括正面描畫，卻沒有理由感到自滿。

第三部分「題材與取徑」以論題為取向，大致上更為聚焦於新的史學問題。盧葦菁論文以新近相關的重要學術成果為基礎，就中國家庭、性別及性的歷史提供一個概觀，表明中國婦女歷史不能再簡單地敘述為無窮無盡的受苦及受害故事。王德威論文介紹中國近代文學，闡明近代文學實踐與中國民族國家興起的關係密不可分的論點。Peter Purdue 論文表明中國環境史領域雖明確出現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卻有更長的起源和醞釀期，原動力來自古代中國農業史的學術研究傳統，以及上世紀初敏銳的西方史家與中國相互交往。作者從環境維度提出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實為帝國擴張，漢族與外族疆界如何建構的一部分。Carla Nappi 論文目的在於捕捉一個方興未艾的領域趨於圓熟的一刻。作者提出一些賦予領域活力的重大問題，突顯幾個最

有希望探討及處理那些問題的方法，提示若干未來充滿期待的概念及成果，並先從翻譯在形塑知識與實踐場域的重要開始。論文標示一些中國科學、技術及醫藥出現其中的套疊場域，追溯科學實踐與知識幫助建立這類空間形態的方法。William P. Alford 與 Eric T. Schluessel 的合著論文表明中國法律及法律文化傳統悠長，先就十九世紀以降中國與西方描畫中國法律的主要方式，提供一個概要，接著檢視為何和怎樣改變，最後討論中國法律史研究向前邁進時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為使法律意識在中國歷史進程的發展更豐富，作者力主應以較為細緻的取徑，排除萬難，把實證與規範分離。Thomas S. Mullaney 論文檢視最近歷史編纂所出現，有關帝制晚期至近代的族群、國族主義及認同等相互關聯的一些核心問題。Barend J. ter Haar 論文聚焦於地方團體利用宗教文化形塑其生活的動力，以及當今民間宗教的復興。Richard von Glahn 論文探討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降近代以前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典範轉移；從加州學派提出的大分流爭論，聯想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降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促使史學家重新注意經濟制度(如產權、契約、解決爭端機制、信用市場、商會，法人管理等)的功用，以及其對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含義，把當代變遷與歷史再解釋聯繫起來。Shellley Riggat 論文簡介在變動的政治和區域情況下的台灣史研究，勾勒從首批人類移居到二十世紀的台灣歷史概要，顯示社群歷史論述對身份認同至關重要，表面上學術性的歷史問題如何隱含於當代政治中。Henry S.N. Yu 論文以近五百年來華人的海外遷移，學界對它們的理解，以及海外華人非正式網絡的新生為焦點。

如前所述，本書旨在針對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狀況、近期及未來一些引人注目、饒具前景的學術動向，給廣大不同對象的讀者掌握最新發展脈動。當前中國歷史學界最為關切、卻甚具爭論性的熱門議題，諸如唐宋變革、新清史、漢化觀念、大分流，以及近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塑演變等，書中都有明晰簡要的探索。對於前人堅持的成說，書中相關論文也揭示典範轉移而提出質疑與挑戰：例如過去有關中國婦女的支配論述厥為受害、犧牲，家庭則為罪魁禍首。新的研究受歐美性別及家庭史研究啟迪，利用其所提供的分析架構、範疇及辭彙，故能另闢蹊徑；而帝制晚期婦女著作的展現，讓研究者獲得聆聽婦女本人聲音的空前機會，從而對婦女生活及其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瞭解更為細緻。從婦女為中心的視野出發，重新檢視家庭史，並重建性的歷史，將性別整合到中國歷史更為遼闊的論述。同樣類似典範轉移的情況，也見於 Michael Puett 與 Richard von Glahn 等論文，茲不多贅。

對於中國史研究的新取徑，特別是時空定位，書中論述頗見周至。第二部分如 Charles Holcombe、Nicolas Tackett、Michal Biran 及 R. Kent Guy 等論文俱反對中國歷史分期相沿成習的理解，指陳先前以王朝為歷史記載時段單位的缺失，提出時間限度意義何在的嚴酷質疑。在空間方面，Michael Puett、Charles Holcombe、Michal Biran 等論文即以遼闊的視野，將中國放於更新、更大的比較架構(早期的中國與歐亞〔如將秦統一視為歐亞廣泛現象〕、中古的中國與歐洲、非漢族的征服王朝與內亞

遊牧帝國)。程美寶論文則將焦點下移到地區層級，揭示地方史在形塑中國社會史主導發展的重要意義。經過這樣的處理，歷史分析會更為明確注意改變甚麼及何時改變。書中多篇論文(如 Nicolas Tackett、Michal Biran、Thomas S. Mullancy)表明饒具政治含義，與認同建構的深思熟慮方案息息相關的關鍵詞，如中文的中國及漢，英文的 China 及 Chineseness 等的複雜性，須加細緻處理的重要。

本書內容涉及多個不同的研究領域，對主編者來說，题目的選定與取捨不易為功，最明顯莫過於本書選取兩篇文學史論文。儘管編者指出，如 Graham Sanders 一文所示，就近代以前中國的漢學傳統來說，廣義上的文學資料，實與歷史研究密切相關，文史之間強作區分純屬人為(頁5)。必須指出，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舉世中國學界研究領域中最為熱門的傳統及當代中國思想史，¹在本書竟付諸闕如。事實上，編者對課題取捨的局限及困惑瞭然於心。他注意到這類手冊性質的書籍覆蓋範圍難期全面，很多理應包括在內的重要論題(諸如儒學史、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等)因體裁結構上不易於安排處理而作罷。總而言之，編者對課題選定的態度雖不能盡愜人意，卻大致公允，不宜苛求。

整體來說，本書所收論文篇幅長短適中。除了少數較為專門的篇章(如 Carla Nappi 有關科學、技術及醫藥一篇)，對一般讀者來說，絕大部分論文的內容都簡明扼要而易於理解。當然，本書所收論文多達二十八篇，素質參差自難避免，少數論文確以教科書般資料豐富的導論或概觀方式呈現，唯個別作者在論述及個人解釋之間編排的適當平衡方面，確是備盡心力地斟酌推敲。筆者建議讀者應先讀導論一篇，蓋此篇要言不煩，綱舉目張，發蹤指示，有畫龍點睛之效。本書的書目洋洋近四十頁，其所反映的學術資訊新而全面完整，對攻讀博士、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來說，按圖索驥，觸類旁通，當可探驪得珠，受益無窮。美中不足的是，或因成本考量，書中論文的資料出處，俱以作者的姓及資料出版年份標示。讀者若要獲得完備訊息，必須就書目相關部分逐一覆按，徒增不便。

一本四百多頁的大書，錯誤及可資商榷處難免，本不應吹毛求疵。不過與一般史學論著不同，本書對有志治史的人，特別是初學者來說，不啻一冊入門治學指南，為他們指引迷津，過多的不必要錯誤實不應出現。茲就閱讀所見，提出以供編者及作者斟酌參考，希望異日有機會再版時能一一予以更正。

年代及史實方面，頁146，一群圍繞趙匡胤的軍閥成為後周的支配力量，於969年叛離而建立宋朝，969實為960之誤；1234年後以東北及華北為統治基地的金朝，按1234年金為蒙古所滅，1234實為1127之誤；更具挑戰性的是蒙古，1234年摧毀金國，1276年滅(南)宋，1276為1279之誤。頁149，“... when the monarchy appeared dysfunctional, such as the abduction of the Xuanzong emperor in 1449, ...”，Xuanzong

¹ 何炳棣：《讀史闕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446。

實為 Yingzong (英宗) 之誤。頁 153, “Grievous but not mortal defeats were inflicted on the Chinese in the . . . Sino-French War of 1881–83 . . .”, 中法戰爭發生於 1883–85 年, 而不是 1881–83。頁 231, “The Mongol conquest of China in the Yuan dynasty (1260–1368) meant literati suddenly found themselv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hierarchy. . . . Chinese literati of both regions [north and south China] found the usual path to officialdom cut off when empire-wide examinations were disestablished.” 所述基本上與史實不相違背, 卻非歷史的完整面相, 需要稍加補充。按: 蒙元早期官員選拔任用以根腳(家庭背景)為主要考量, 故遲至 1315 年才恢復科舉。科舉在江南中斷凡四十年, 在金朝故地更長達八十年, 期間文士階層確是喪失主要傳統的入仕途徑。科舉於 1315 年恢復, 從 1315 至 1366 五十年間元代科舉前後舉行十六科, 共錄取進士 1,139 人, 每科錄取少則五十人, 多則九十餘人, 唯有 1333 年錄取足百名。² 元代江南士人家族不少入籍「儒戶」; 「在元代社會中, 除去統治階層的貴族和官吏外, 儒戶仍是諸色戶計最受優遇的一種。……『九儒十丐』之說, 並不反映事實。……和其它各代儒士相差最大的是在仕進機會及在社會上所受尊敬兩方面」。³ 頁 290, “In the year 1114, the ethnically Chinese Song dynasty (960–1297) lost its capital and northern territories to Jurchen invaders . . .”, 1114 為 1127 之誤, 1297 則為 1279 之誤。頁 365, 1392 年李成桂推翻高麗朝, 建立李朝, 統治朝鮮, 直至 1905 年。按 1905 年日俄戰後, 日本獲列強承認其在韓國的主導地位, 並於 1910 年實施日韓合併。

人名方面, 頁 130, “Baoerhan et al. 1986”, 作者包爾漢為維吾爾族人, 採用拉丁化維文譯名 Burhan 較妥(書目頁 379 同)。頁 216, “The famous ‘cut-sleeve’ story tells of Emperor Aidi of the Han . . .”, Emperor Aidi 改作 Emperor Ai (哀帝) 較妥(參見頁 224, Emperor Wu)。

地望方面, 頁 152, “. . . but the reign saw a concerted campaign by Ortai, . . . to enforce Chinese modes of life and government on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east”, southeast 顯為 southwest 之誤。頁 163–64, “Some Muslims, for example many of the Uighurs in present-day Xinjiang, . . . speak a Turkic language and tend to identify culturally and religiously more closely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to the north than with Han Chinese.” north 改作 west 與事實較為相符。頁 263, “After the fall of Zheng rule, Kangxi’s policy of evacuating the southwest coast . . .”, southwest 當為 southeast 之誤。頁 292, “To the south and west of Xinjiang sits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 . .”, 西藏自治區在新疆之南, and west 當刪去。

² 參見蕭啟慶:〈「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前言〉,載蕭啟慶:《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頁334;〈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載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149、155。

³ 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載《元代史新探》,頁14–15、39;引文參見頁39。

論證謹嚴程度方面，頁283–84，“On the basis of archival material, [Philip] Huang developed the idea of a ‘third realm.’ This was a conceptual space for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ystems . . . , which is to say between the ‘centralized minimalism’ by which the Chinese state navigated between charisma and bureaucracy and the ‘practical moralism’ that guided imperial-era officials.” 這樣重要的一段話，來源闕如，令人費解。類似情況又見於頁282，“Edwards, along with Chang Fu-mei and Chang Wejen, advanced these efforts through translations of cases from the code commentary *Questions Raised while Reading the Substatutes (Duli cunyi)* as well as through probing (albeit largely unpublished) explorations of the legal reasoning of Qing magistrates.” 另 Edwards 應詳細標示姓名，不宜略稱。

資料出處及出版資料方面，頁82，“E.L. Jones’s ‘ghost acreage,’ 1987, 70–84”，1987為1981之誤（參見書目頁400）。頁134，“Zhao Ma 2008”，應作“Ma 2008”（書目頁434，“Zhao Ma. 2008a”，正確姓名為 Ma Zhao〔馬昭〕，作者以西方習慣處理而致誤；2008a 應作2008）。頁135，“Xibei di er minzu xueyuan 2005”，正確應作“Xibei di er minzu xueyuan, Shanghai guji, and British National Library 2005”（參見書目頁431）。頁146，“Mote 1963, 11”，1961誤作1963（參見書目頁411）。頁151，“Wong and Will 1985”，1985為1991之誤（書目頁430同）。頁187，“Guo and Lin 2005; Lin 2005”，覆按書目頁396、406，Guo and Lin 2005、Lin 2005書名俱為 *Siqing yundong shilu* [Record of the four clean-ups campaign]，出版地點及機構俱為 Hangzhou: Zhejiang renmin。實際上，與上述出版資訊符合者為：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2005）。職是之故，“Lin 2005”及書目“Lin Xiaobo 2005”條，俱為衍文，應刪去。頁188，“Yang 2011b”，正確姓名為蘇揚，作者依西方習慣處理而致誤，應更正為 Su 2011b（書目頁433同）。頁281，“Some scholars, such as Shuzō (1974–75) . . .”，書目資料闕如。按資料來源應以作者的姓標示，故 Shuzō 應作 Shiga（滋賀）（參見書目頁420）。頁298，“Elliott 2011”，覆按書目頁391，2011年 Elliott 著作有 a、b 兩項，應明確注明。頁298、299，資料來源作“Chow 1995”；頁300作“Chow 1997”；頁302，延伸閱讀建議則為“Chow, Kai-wing. 1995. ‘Imagining Boundaries of Blood: Zhang Bingli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Chinese Race in Modern China.’ In *Racial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ed. Barry Sautm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莫衷一是。事實上，正確資訊應如書目頁386所示：“Chow, Kai-wing. 1997. ‘Imagining Boundaries of Blood: Zhang Bingli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Han ‘Race’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ed. Frank Dikötter, 36–4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職是之故，頁298、299，資料來源應作“Chow 1997”。頁328，“Su Beng 1986”，應作“Shih Ming [Su Beng] 1986”（參見書目頁420）。按 Shih Ming 實為 Shi Ming（史明）之誤。頁353，“Williams 2002”，書目闕如。

詞彙表，頁372，“*buzhi*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the book catalogues in the standard histories) 志”，應作「補志」。

書目部分，除前述錯誤之外，頁408，“McKnight, Brian. 1981”，應移於頁409，“McKeown, Adam. 2008”之後。頁415，“Qiu Pengsheng (Ch’iu Peng-sheng). 2008. . . . *Ming Qing Zhongguo de shantey falü*”，*shantey* 當改為 *shangye* (商業)。頁419，“Shen, Zhihua. 2008. . . . Vol. 3: *Sikao yu xuanze*: . . . [Reflection and principle: . . .]”，*xuanze* (選擇) 正確翻譯應為 *choice* 或 *option* 而非 *principle*；“Shen Zhihua and Li Danhui, eds. 2006. . . . *lai zi Zhong-E shuangfang de dang’an wenxia*”，*wenxia* 實為 *wenxian* (文獻) 之誤；“Shi Jinbo, Nie Hongyin, and Bai Binyi, eds. 1994. *Xi Xia tiansheng lüling yanjiu*”，正確應作 Shi Jinbo, Nie Hongyin, and Bai Bin (白濱), eds. 1994. *Xi Xia Tiansheng lüling* (西夏天盛律令)。頁430，“Yuen-fong Woon. 1984”，編者依西方習慣處理而致誤，應更正為 Woon, Yuen-fong (參見頁353)。頁431，“Xi Jinping. 2012. . . . *zhaozhe zhonghua* . . .”，應改為 *chaozhuo Zhonghua* (朝著中華)；“Xibei di er minzu xueyuan, . . . 2005”，按此書為中英三家學術出版機構編纂之作，2005前應加插 *comps.*。

本書充分引證近人的相關研究成果，饒具趣味及說服力，達成其所揭櫫的目標；開卷有益，當為專家、莘莘學子以至一般讀者所共賞。陳寅恪嘗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⁴好學深思者閱讀本書後，雖不一定能臻「預流」之列，至少「未入流」的可能或會大大降低。遺憾的是，本書售價奇昂（高達195美元），圖書館而外，誠非一般學人所能負擔。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⁴ 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載陳垣（編）：《敦煌劫餘錄》（193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年），序頁一上。